

社会“阶层固化”再不可漠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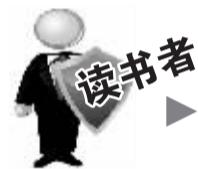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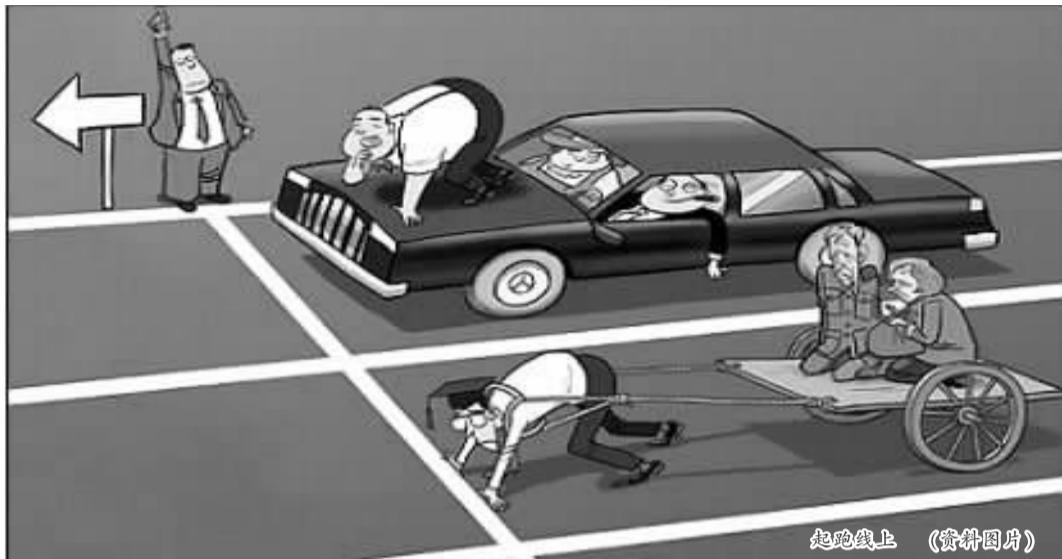
专家称底层人群向上层流动受阻,成本高渠道变窄

□据《广州日报》

今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提出一个疑问：穷会成为穷的原因，富会成为富的原因吗？文章感叹，贫富差距加大的趋势日趋严重，“阶层固化”所导致的严峻社会现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再不可漠视。

早在2004年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调查报告就指出：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多。课题的组长陆学艺当时就警惕地指出：“如果三年、五年乃至十年、百年长此以往，就不是2.1倍的问题了，这个数字就会高得多了。”

近年来，“农民工二代”、“贫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垄二代”（全家几代人都在国有垄断企业）的概念日渐清晰，人们感到改变命运的渠道越来越窄。由社会底层向中间阶层以及更上层流动的难度真的越来越大了吗？



知识不一定能改变命运

2009年，全国高考弃考人数达84万。为何造成缺考人数多，人口逐减、个人成绩差等是不容忽略的客观原因。但有媒体报道，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生“就业难，收入低”。“昂贵的学费”、“毕业即失业”是农村学生弃考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在在山东省政府部门工作的周兴在家乡被传为神话。10年前，这个出生在湖北省西南部农村

一个土家族的孩子，考上了山东某著名大学，从而人生发生转变。然而，近年来，这个神话成了绝版。

“近几年，村里考上大学的孩子不少，但都是一些不知名的学校，真正考上名校的几乎绝迹。”周兴觉得很惋惜。

作为国家级的贫困县，周兴的乡亲中，能承担上万元大学学费的并不多。“靠地吃饭的农民一年能攒下几千元，算是好的。”周兴说，

看到不少人在外面打工能赚钱，现在家里的孩子们要么去读技校学手艺，要么就外出打工挣钱。

从古至今，“读书受教育”一直是底层人士实现向上流动，改变自身命运的一种方式。1978年我国恢复高考后，一大批贫寒子弟通过高考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许多人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读书。然而，这种观念正在慢慢发生变化。

录取差距致农村大学生少

“他们也想孩子有个好出路，不过，现在看来，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靠读书改变命运已成记忆。”周兴有些感慨，“当年，我们每个人都想到县城的好高中。虽然试卷相同，但我们的录取分数必须

比县城的学生高10分。”这个道理在高考录取中也是一样。全国各地学生考取北京著名大学的分数就高于北京市户籍的学生。有调查显示，在重庆市，每5个考生中几乎就有一个考生加分。

2010年加分人数占到17.19%，2009年更是达到30%。而农村的孩子更少有获得加分的机会。北京大学教授潘维的一组数据印证了这一说法，北大农村学生的比例从20世纪50年代的70%降至如今的1%。

考上大学也难有好出路

“考上大学的多，而考上名校的少。”从安徽六安农村读书出来的李伦，其父亲是当地一所学校的校长，他常听到父亲感慨，“靠读书出人地也难”。他的家乡是典型靠“打工经济”发展起来的。“出

去打工的人，家家户户都盖起了小洋楼。反而是自己这种大学毕业后在城市打拼，靠自身能力买房都有些吃力的人，根本没能力再给父母在家盖楼。”李伦说，以前回家过年，乡亲们都会投来赞誉的眼光，现

在反倒自己觉得不好意思。李伦感慨，虽然读好书仍然是乡亲们亘古不变的“信条”，但他们也逐渐有选择性地趋利避害，即便是读了好大学，没有路子，也很难找到一份好工作。



改变命运的梦想难圆

“现在给年轻人的机会，还是少了些。”中国探月工程副总设计师龙乐豪如此感叹。他幼时家庭贫困，只得在家放牛。直到1949年武汉解放，11岁的龙乐豪才得以读小学，日后并有机会去改变命运。他说自己一个没什么背景的农村娃娃，能够有今日的成就，除了靠自己，更是得益于机遇。

20年来，在中国农村，出门打工改变命运，衣锦还乡的梦想一直流传着。许多年轻的农民工正是怀着这样一个“淘金梦”走进了城市。但是随即，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淘金

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随着国家经济转型，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打工的收入一直不见增加。受政策的限制，农民工们缺少应有的社会保障和与城市人平等的福利待遇，加上城乡差距的扩大，城市门槛的提高，进一步减少了农民工扎根城市的可能性，向上流动的空间更是少之又少，背井离乡的人们早已“淘金梦”碎。

今年19岁的杨王邦是广西钦州的一个普通农村孩子。当他的同龄人正踏进大学校门的时候，他已经是南宁一家炸药厂中有着3年工作经验的熟手。然而，今年他辞

去了这份每月工资1500元、看起来“还可以”的工作。原因是要与正在东莞打工的父亲杨贵合一起工作，“父子有个照应”。

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的杨王邦说，自己本来就不是读书的料。在他眼里，比他大两岁的堂哥见多识广。堂哥告诉他，出来打工就是见见世面，感受一下城市，发财的梦想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能够不做普通的纯劳务工作，找一份技术性强的岗位工作，才是他们踏踏实实的前途。

在9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眼里，城市并没有他们改变命运的梦想。



美好生活拼的是爸爸

2009年下半年，南京市下关区劳动就业管理中心进行的一次事业编制人员招聘中，录用的4人中有3人是局领导的子女。据其上级单位解释，此次招

聘本身就是面向包括在编的无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以及局系统职工的子女或配偶。这是系统内的一次“公开、公平”招聘。

“官爸爸”帮忙升学就业

王心(化名)并不否认自己“官二代”的身份，父亲是中部某地级市的高官。而在高中老师和同学的眼里，聪明好学的他绝对是清华、北大的苗子。然而，高考那一年，命运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他的高考成绩离北大的录取线差了几分。在他父亲开了一张能够加分的“凭据”后，他才险过录取线，走进了大学校门。2003年

大学本科毕业后的王心，也曾想靠自己的能力拼搏。然而他觉得“理想与现实相距太远”，在父亲的帮助下，最终进入某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工作。

王心不避讳去谈这些，因为这一切都是现实。在王心的同学中不乏优秀之人。但大学毕业后，那些没有社会资源的同学只能盲目地去寻找机会。

“富爸爸”设计儿子人生

老家山西的林国(化名)，现在是中央某部门的一名公务员，他坦言，自己从读硕士到考公务员，都是家人为他设计的。他的爸爸就是人们常称的“煤老板”。读大学的时候，同学们开他的玩笑说：家里的钱多得要用卡车运出去。但是，爸爸没有要他接手生意，而是叫他到政府部门做事。最终在父亲的指点和“支持”下，他报考了中央某机关的冷门职位，并顺利考上。不久，爸爸又为他在北京四环

买了一套房子。林国说，他完全没有体会过同龄人“北漂”的感觉。刚毕业几年，他周围过得比较好的同学，大多要靠父母的经济、关系做坚强后盾。找工作、买房、买车，哪一样缺了父母的支持都不行。

据“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状况调查”显示：以毕业后半年为界，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有3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而管理阶层子女未就业的只有15%。



社会资源在集聚 后继改革没跟上

社会学家陆学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现在的危险不在于上层人物开始兼具三种社会资源（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而是公平、公正、合理上做得不够。渠道开放不够，比如户口制度卡着，农民子弟除

了考大学这条路，没有别的渠道向上流动，即使出来打工，还是个农民工。”他提醒，社会资源在集聚，而后续的改革没有跟上，户口、就业、人事制度基本上还卡着，社会流动的渠道有被封闭的危险。